

读报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群众开展以党报党刊为主要内容、与政治思想教育和文化教育相结合的集体性学习活动。中央苏区时期，读报运动在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、传达学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、提高群众知识文化水平、扩大党报党刊影响等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。

“对不认字党员读书报”

由于中央苏区地处偏远山区，经济社会极为落后，老百姓普遍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。在这种恶劣环境下开展土地革命，首先迫切需要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，帮助群众读懂革命的目的和方式。中央苏区读报运动分为四个阶段。

初始阶段。1927年10月至1930年2月，井冈山斗争时期组织推广了读报运动。毛泽东在《古田会议决议》就党内教育的问题，提出利用党报，开展“有组织地分配看书”及“对不认字党员读书报”等方法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，清除红军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。红军从创办各种简易刊物、成立宣传队起步，广泛采用简便易行的传播手段，如标语、歌谣、传单、布告、壁报、简报等方式，来发动群众读报。部队和群众中逐步建立起读报小组，读报成为政治学习和文化教育的重要手段。

发展阶段。1930年2月至1931年11月，中央苏区创建过程中，毛泽东领导红军各基层单位创办《时事简报》，号召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都参与读报。与此同时，党中央高度重视读报运动，1931年1月颁布的《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》明确要求各地举办“读报班”。1931年7月1日，少共苏区中央局在《青年实话》创刊号上号召青年群众正式开展“读报运动”，这是中央苏区首次将读报从“活动”上升到“运动”的层面，标志着读报运动全面铺开。

高潮阶段。1931年11月至1934年10月，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，《红色中华》《斗争》《红星》《苏区工人》等党报党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为大规模开展读报运动创造了良好条件。读报运动覆盖面迅速扩大到中央苏区党政军民的各个方面，各地普遍建立起读报组、识字班，设立列宁室俱乐部，建立读报规章制度，开展读报竞赛等。

延续阶段。1934年10月之后，中央红军在长征极端艰苦的条件下，坚持办《红星》报，一有闲暇就组织红军战士读报，开展政治思想教育，鼓舞斗志。

这个巴掌大的方盒量出了最早的“中国标准”



战国商鞅方升，全长18.7厘米，容积202.15毫升。

这个只有巴掌大的铜方盒，与秦始皇画像、大名鼎鼎的兵马俑一起出现在了中学历史课本上。它以小小的身躯，完成了“度量天下”的使命。商鞅方升，虽然体量不大，颜值不高，可身上刻的两组铭文让它非同寻常。第一组在方升侧壁，是“产品说明书”：

生产时间：秦孝公十八年（公元前344年）
设计和监制官员：商鞅 大良造（当时秦国最高官职）

参数：一升，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（约为现在的202.15毫升）

第二组是方升底面的40字铭文，这是秦王政26年（前221年）的诏书：

廿六年，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，黔首大安，立号为皇帝。乃诏丞相状（陶状）、绾（王绾）：法度量则不一，歟（嫌）疑者，皆明一之。

大概意思就是：天下一统，人民安定，全国推行商鞅既定的标准，代替旧国复杂的量制。

两组铭文相距不到两厘米，却跨越120多年，从战国群雄到天下归一，从一国的标准到天下的标准，这些文字见证了中国历史走向的“决定性瞬间”。

秦朝实现“一升量天下”，基础则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变法。废井田，重农桑，实行郡县制，统一度量衡。这些举措使秦国在二十年间富国强兵，拥有了统一天下的强盛国力，其中，统一度量衡是不可缺少的一环。最初，人们采用一些直观的方法进行度量，“布手知尺”“掬手成升”“迈步定亩”，双手一捧，就是一升。这种“大概其”的方法显然不精准。不要说各国之间，就是一国之内、各家各户差异都很大。统一度量衡后，国家土地划分、产量计算、征税纳粮，都能得到精准的保障，支撑起秦国兼并六国的征战，奠定了秦朝大一统的根基。

正所谓“商君虽死，秦法未败”。虽然商鞅因变法失去了生命，但他监制的方升和他提出的法度一起成为了大秦帝国的重物与基石。商鞅方升也成了这一阶段历史重要实物例证。

作为“国家级标准”，商鞅方升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采用科学方法的量器，其中蕴含的科学理念和标准观念一直持续至今，促进社会经济科技进步，创造越来越多的“中国高度”和“中国标准”。（据《北方新报》）

中央苏区的读报运动

“讲报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方法”

在党和苏维埃政府推动下，中央苏区读报运动从党内走向广大基层群众，逐步从散、小、弱走向了规模化、制度化、规范化和常态化。

建立读报场所列宁室俱乐部。列宁室制定了专门的读报工作计划，不断创新方法，提高了群众参与读报的积极性。各小组长经常进行宣传引导，吸引群众来到列宁室看书报、研究问题、参加工作。

规定读报的主要内容。读报主要读墙报和党报党刊，不同人群所读的党报党刊各有侧重。其中，《斗争》是各级党组织的必读刊物，《红色中华》报是广大群众的普读刊物，红军战士必读《红星》报，青年团员和儿童团必读《青年实话》，工人必读《苏区工人》，以及各县县苏维埃、各军政治部、各行业办的机关报分别被相应群体列为读报内容。

明确读报的方式方法。根据文化程度的高低分成不同的读报班，每个读报班人数控制在10人左右，最多不超过20人，读报时间一般在农闲时节和夜校活动，由墙报委员、通讯员或者文化程度较高的人担任领读员，带领全班读报、讨论和竞赛。群众读报之后，有的将读报体会写信告诉前线的红军战士，鼓励他们

读报运动在提升群众政治觉悟、动员支持革命战争、促进苏区政权建设、提高群众文化程度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。

凝聚人心，提升群众政治觉悟。各行各业党员群众积极购买党报党刊，工作人员组织政治讨论会，讨论党及苏维埃政府、中革军委的决议与策略路线，使政治水平较低的同志对政治形势有更深刻的认识。

鼓舞士气，动员支持革命战争。红军与群众通过读报来互相鼓励，团结一心，同仇敌忾，共抗强敌。前方红军战士热情地参与读报、唱歌、呼口号、讲故事，斗志昂扬，随时准备冲锋杀敌。后方红军家属参加夜校组织的读报课，最喜欢听前方的胜利消息和各地动员情形，“他们总要兴奋得跳起来”。

动员力量，促进苏区政权建设。读报运动鼓舞了民心，激发了斗志，引导广大党员群众积极投身到苏维埃建设工作中。比如在经济战线方面，党员群众踊

跃购买经济建设公债，有的还把伙食尾子节省下来购买公债券。在拥军优属方面，瑞金全县红军家属代表大会给全苏区红军家属发出通电，提出做“模范苏维埃公民”的七个条件，条件之一就是红军家属“要做到人人都会看红色中华”。

扫盲教育，提高群众文化程度。读报运动与扫盲、识字、夜校相结合，极大提高了群众的文化程度和学习积极性，成为中央苏区文化教育的一大创举。识字班是读报运动中常见的组织，《红色中华》报经常被识字班列为教学材料。这种识字的过程可谓一举两得，群众既可以学文字使用和表达技巧，又可以获得大量的时局信息。大批苏区群众因此摘掉了文盲半文盲的帽子，许多适龄儿童走进了学校。据《青年实话》载，印刷厂青年工人张一台在写给战斗在火线的哥哥张一昌的信中说：“我天天都有新的报纸杂志啦，比较重要的就有读报班的同志讲给我们听”“好快活的一天过一天”。（据《学习时报》）

跃购买经济建设公债，有的还把伙食尾子节省下来购买公债券。在拥军优属方面，瑞金全县红军家属代表大会给全苏区红军家属发出通电，提出做“模范苏维埃公民”的七个条件，条件之一就是红军家属“要做到人人都会看红色中华”。

扫盲教育，提高群众文化程度。读报运动与扫盲、识字、夜校相结合，极大提高了群众的文化程度和学习积极性，成为中央苏区文化教育的一大创举。识字班是读报运动中常见的组织，《红色中华》报经常被识字班列为教学材料。这种识字的过程可谓一举两得，群众既可以学文字使用和表达技巧，又可以获得大量的时局信息。大批苏区群众因此摘掉了文盲半文盲的帽子，许多适龄儿童走进了学校。据《青年实话》载，印刷厂青年工人张一台在写给战斗在火线的哥哥张一昌的信中说：“我天天都有新的报纸杂志啦，比较重要的就有读报班的同志讲给我们听”“好快活的一天过一天”。（据《学习时报》）

古代文人画家的“双清”情怀

“冰魄无梦到瑶阶，翠袖云鬟并玉钗。青鸟暮衔红绶带，夜深重认合欢鞋。”元代泰不华在《题梅竹双清图》中，将梅与竹合称为“双清”，赋予梅花、劲竹“冰魄”“翠袖”的人文意蕴。

“美人宴罢酒初消，凌乱云鬟压步摇。莫遣翠禽啼梦断，醒来无处托春娇。”元末明初诗人、画家贡性之，在《题翠竹红梅》中，以拟人的笔触，诠释了梅竹“双清”的另一种文化底蕴。清，乃洁净、纯洁、正直、明晰，与“浊”“浑”相对，是中国古代文人画家崇尚和追求的一种境界。西汉淮南王刘安编著的《淮南子·原道训》曰：“圣人守清道而抱幽节，因循应变，常后而不先。”《书·微子》亦有“身中清”的记述。

历代文人画家，喜欢以大自然中富有寓意的植物和其它自然景致入画，作为自己的人格操守及精神寄托，主要以梅、兰、竹、菊、松、水仙、梧桐以及鹤、石等组合成“双清”图案，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。自元至清，描绘“双清”题材的传世古画甚多，不过其“双清”组合却各有不同。梅，傲霜斗雪，无畏风寒，且一尘不染，恪守“不受尘埃半点侵，竹篱茅舍自甘心”的本质，一直以来都是文人题咏、图绘的重要题材，宋代隐逸文人林逋甚至将梅视为妻子，在其居住地广植梅树，并留下了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的清丽诗句。竹，修身直立，中空有节，秉性坚直，风骨独具，历来深受古代文人青睐，他们植竹为邻，以竹自比。宋代大文豪苏轼甚至发出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无肉令人瘦，无竹令人俗”的由衷感叹。

古代名画以梅花和劲竹为“双清”，这种组合几乎占据了绝大多数。清初画家石涛的《梅竹双清

图》，绘一株古梅铁骨铮铮，数竿新篁生机勃勃，并题有长达数百字的七言诗句款识。清代思想家龚自珍亦画过一幅《梅竹双清图》，取扶摇而上的梅树枝干及小部分新生嫩竹的竹叶入画，疏澹梅竹，傲雪相伴，红绿相间，清艳双绝，充满了“万木冻欲折，梅折不疑寒”的高洁品性。另外还有元代画家王冕、吴镇，清代画家罗聘、汪士慎，近代画家吴大澂、关山月、谢稚柳、李苦禅、张大千等等，他们都有《梅竹双清图》的作品传世。凡此种种，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历代文人画家对梅竹“双清”的喜爱之情。

明代画家边景昭、王统合作绘制的名画《竹鹤双清图》，以劲竹和白鹤为“双清”，边景昭画两只白鹤于石边振翼举足，气度娴雅，轩昂高洁；王绂画一丛新篁修竹亭亭而立，凌寒修身，清新出尘，二者珠联璧合，构成动植物“竹鹤双清”的主题寓意。清乾隆皇帝观赏此画后大为叹赏，兴致勃勃地御笔题诗一首于画上：“九龙沙县两幽人，一味芝兰气合亲。恰似绿筠将白鹤，无心常自结高邻。”

明代青藤画派鼻祖徐渭画过一幅《双清图》，以竹枝和水仙为“双清”组合，水仙冰肌玉骨，温婉清雅；竹枝虚心向上，高风亮节，两种植物蓬勃生长，花叶传神，清气满幅。清代画家恽寿平善画花卉，他以梅和水仙组合成《双清图》，二者都开在霜寒之际，互为映照，花香袭人，雅洁可爱，清气满纸。各种“双清”组合的传世名画还有很多，元代画家倪瓒以梧桐和竹组成《梧竹秀石图》，明代著名花鸟画家陈淳以菊石组合绘成《双清图》，清代画家胡公寿《兰竹双清图》等等，都是极富代表性的“双清”名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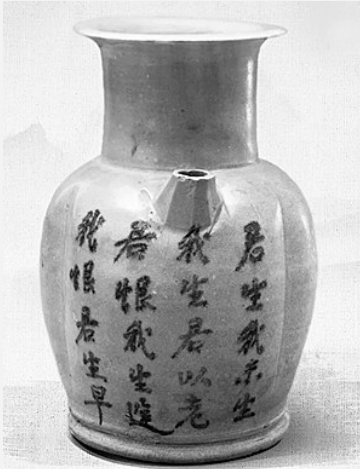
值得一提的是，古代画家亦有将“双清”扩展到“五清”的。如清代画家杨晋、唐俊的《五清图》，由梅、竹、石、水、月组成，有植物，亦有自然景物。作者将五种物象的自然属性和审美特征巧妙组合起来，加以提炼升华，揭示了画作的审美情趣。杨晋在画上题诗一首，其中“石边修竹拂云长，铁干寒梅白玉香。最是夜深清寂处，月明和影浸沧浪”的诗句，诠释了画面所蕴含的“五清”意境。

“不要人夸好颜色，只留清气满乾坤。”这是元代画梅名家王冕在他的《墨梅图》上自题的题画诗的后两句，将梅花拟人化，表现了画家鄙薄流俗、独善其身、不求功勋的品格，体现了以梅自比的精神追求及清正修身的立身之德。

无论是“双清”，还是“五清”，都蕴涵着中国的哲学和文化属性，是古代文人画家的精神写照。历代文人画家通过植物及自然景物的姿态、色彩和特征，在泼墨挥洒、精心构建清雅出尘的艺术氛围时，其内心世界的张力无疑是巨大的。他们通过描绘“双清”自然物象，将其真实品性人格化，托物抒情，以画言志，既寄托了作者的情感，又充满了美好的艺术旨趣。（据《西安晚报》）

■ 溯源 ■

“君生我未生”，出处在这里……



“君生我未生，我生君以（己）老。君恨我生迟，我恨君生早。”据现有资料考证，这首广为流传的五言绝句，最早就是出自长沙窑瓷上的诗句。

古时女子对男士或丈夫敬称“君”，可知此诗用女子口吻。全诗实际用字仅九个，一字不提“爱”，倾诉了与“君”苦恋却不能相伴终生的遗憾。

这首诗广为流传，但它并非名家大作。长沙窑是未见于史籍记载的民间窑器。在已发现的几百件器物上题写的各种诗句，基本属于流行在市井里巷的歌谣，也有可能是窑工创作。由此可见，唐人浪漫名不虚传。

“君生我未生”诗词壶代表的长沙窑一个最重要发现，确定了这里是釉下多彩的重要发源地。唐代前期，中国陶瓷呈现“南青北白”的生产格局。中晚唐时期出现了釉下多彩技法，将铁、铜等呈色剂掺入颜料，用毛笔在未烧制的瓷器上绘饰图案，再覆盖上一层釉烧烧，使色彩从釉下呈现，大大提升了美观度。

■ 拾遗 ■

一块见证光荣起义的手表



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中，陈列着一块生产于20世纪40年代的手表。它的主人是指挥黄安舰起义的舰务官鞠庆珍。这块手表表盘直径3.5厘米，正面印有孙中山先生的头像与“国父”二字，银灰色的表链上略有锈迹。

1948年秋，青岛成为国民党在山东半岛的一座孤城。当时，国民党当局声称要“死守青岛”，实则暗地里做好了撤离南下的准备，黄安舰也接到了随队行动的命令。1949年1月，黄安舰奉命试航，为南撤做准备。面对严峻的形势，前期已潜伏在黄安舰上的鞠庆珍等起义骨干聚在一起，紧急制定起义计划，将起义时间定在2月12日，即正月十五晚上。

12日，舰长被“动员”回家过节，舰上一半士兵放假登岸。天黑后，副舰长进舱睡觉，被起义骨干锁在舱内。随后，所有参加起义的人员在前舱集合；鞠庆珍宣布起义，并布置了具体任务。随即，黄安舰从青岛栈桥附近海域拔锚起航，按预定计划驶向连云港。

在鞠庆珍的指挥下，枪炮班长孙露山、枪炮军士长王子良、枪炮官刘增厚及舵工张杰等起义骨干，迅速控制了副舰长室和通讯室，切断了黄安舰的对外联络。

就在黄安舰驶出几海里后，一艘美国军舰发来灯光信号询问：“你们到哪里去？”起义官兵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鞠庆珍回答：“风浪太大，去竹岔岛避风。”就这样，他们从美国军舰旁巧妙驶过，向着解放区全速前进。13日凌晨，该舰顺利抵达连云港。

黄安舰起义后，国民党军出动飞机，对该舰进行轰炸，均未命中。同年8月，黄安舰前往青岛，加入人民海军行列，1950年初被命名为沈阳舰。

如今，这块见证光荣起义的手表早已停止转动，但它承载的人民海军初创时步履维艰的历史记忆，仍在岁月长河中熠熠生辉。（据《解放军报》）

共同为他庆祝62岁生日。与会乡亲闯荡四海，身处异乡，然而乡音未改，欢聚一堂，品茗畅叙。席间，有人提议请胡适为本次活动题字留念。胡适用徽州话笑着说道：“写些什么好呢？”他略思片刻，即兴题写了“努力做徽骆驼”6个字，深情冀望各位乡亲不要忘记老家，激励大家要坚守徽州人吃苦耐劳的本色，发挥艰辛创业、努力奋斗的“徽骆驼”精神，凡事坚持忍耐，能吃万般苦，借以与乡亲共勉。

后来，安徽绩溪旅台同乡会创办人胡钟吾将胡适的题字复制精裱，分发给全体旅台同乡，作为他们共同的精神标识。（据《人民政协报》）